

敦煌以西有“敦煌” 丝路以前有“丝路”

——读《新疆哈密天山北路墓地》有感

任瑞波 程展航

从西汉张骞凿通西域之后，丝绸之路便逐步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而以莫高窟为代表的敦煌无疑是古代丝绸之路沿线文明交汇的重要枢纽。也正因此，敦煌便理所当然成为“文明荟萃之地”的代名词。随着科学的考古学在中国各地陆续开展，近一个世纪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不仅巩固了敦煌的历史地位，也越发凸显出了丝绸之路的真实性和重要性。更让人欣喜的是，越来越多的“敦煌”和越来越早的“丝路”正在考古工作者的手下逐步呈现。位于新疆哈密的天山北路墓地，恰是完美诠释敦煌以西也有“敦煌”、丝路之前已有“丝路”的典型。

天山北路墓地位于新疆哈密，早年也称林雅墓地或雅林公墓地。1988年至1997年经过多次田野考古发掘，共清理墓葬706座。部分材料一经披露，便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观点颇多。多数学者认为天山北路墓地可归属或命名一支考古学文化，但观点各不相同：或认为天山北路墓地与五堡、焉不拉克墓地性质相同，属于焉不拉克文化(常喜恩等，1989)；或认为天山北路墓地是“天山北路文化”的代表性遗存，且“天山北路文化”是以四坝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因素和以初尔木切克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因素交融的结果(林梅村，2002；郭物，2012)；或认为“哈密天山北路文化”包括哈密盆地和巴里坤草原两大分布区域和相应的地方类型，前者以天山北路墓地为代表，后者以南湾墓地和兰州湾子墓地为代表(韩建业，2007)；或认为“天山北路文化”的代表性遗存主要为天山北路墓地，而南湾墓地代表的南湾类型与其并非同一考古学文化(邵会秋，2007)。还有学者推测，不排除天山北路文化就是西域驿文化和四坝文化在新疆哈密地区的变体或后裔，甚至可能是这两支考古学文化的地方类型(任瑞波，2016)。当然，也有学者没有轻易将此类遗存归入某种文化，只是称其为“墓地”或“遗存”，认为其包含多种文化传统(水涛，1993；李水城，2009)。总而言之，对于以天山北路墓地文化性质为代表的很多关键学术问题，虽然发表了多种不同意见，但由于当时公布的材料有限，长期以来都无法展开深入讨论，因此，学界对这批材料的完整公布翘首以待。

2024年12月，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等单位编著的《新疆哈密天山北路墓地》出版。发掘报告对该墓地的出土材料和采集品进行了全面梳理和系统介绍，首次为学界揭开了天山北路墓地的神秘面纱，多种墓葬形制和各类随葬陶器、铜器、骨器等遗物一览无余。扎实的基础研究和大量的碳十四测年数据，为学界准确、深入认识天山北路墓地奠定了坚实基础。毫无疑问，随着《新疆哈密天山北路墓地》的出版，困扰学界已久的诸多疑惑如陶器面貌、铜器种类、墓葬形制和绝对年代等已然豁然开朗，但又有一些新的问题随之而来，至少包括以下三点。

第一，如何理解天山北路墓地的“过渡期”。发掘报告公布了41个碳十四测年数据，墓地的整体年代基本清晰——距今4000年至3000年。这就意味着，天山北路墓地的形成经历了约1000年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丰富的叠压打破关系也足以说明，不同于目前新疆已发现的任

何一处史前墓地，天山北路墓地的形成过程极为复杂。早年，关于墓地的分期是以发掘者提出的“四期八段说”为代表(吕恩国等，2001)，但受限于文章篇幅，只有分期结论，没有分期过程。而《新疆哈密天山北路墓地》则基于典型陶器的类型学研究 and 明确的叠压打破关系提出了新的“四期说”，论证过程严谨，分期结论清晰，较发掘者早年提出的分期方案更为深入，也有明显的区别。例如，虽然同为“四期说”，但发掘报告各期之间还有不少墓葬属于“过渡期”，特别是第二期和第三期的“过渡期”墓葬数量多达56座，加上两个“过渡期”，发掘报告提出的分期方案实为“六期”。因此，如何看待和理解所谓的“过渡期”就显得尤为重要。当然，这也同时暗示我们，天山北路墓地的分期方案还可以进一步优化或调整。

第二，如何看待“天山北路文化”。

天山北路墓地发掘以后，有学者提出“（哈密）天山北路文化”的命名(林梅村，2002；韩建业，2007)，学界多有沿用。而此次发掘报告在相关研究部分，似乎既没有明确支持这一观点——未见专门对天山北路文化的内涵和面貌进行总结、提炼和深化，也没有明确反对“天山北路文化”这一提法，相反提出了“焉不拉克文化天山北路类型”的认识，与最初发掘者的观点接近。因此，疑问自然产生，到底有没有独立的“天山北路文化”，如果有，按学界熟知的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原则，哪些典型的陶器、固定的陶器组合、独特的丧葬形制是该文化所特有的，能够代表一支新的考古学文化。此外，除天山北路墓地外，哈密及周邻地区是否还有同类遗址或墓地能够共同撑起天山北路文化。如果没有，那么天山北路墓地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墓葬材料究竟分属哪些已知或未知的考古学文化或其地方变体。其实，即便没有所谓的“天山北路文化”，在距今3500～3000年，哈密与周邻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已经相当复杂，至少包括了焉不拉克文化、苏贝希文化、四坝文化和南湾四种类型，而且这些文化在时间延续和空间分布上都多有重合。关键在于，在天山北路墓地中，那些与上述四种文化典型陶器既不完全相同，但又“似曾相识”的陶器，究竟应该如何判定其文化归属。其实，不管哪一种结论最终成立，天山北路墓地出土遗物的多样性、复杂性和特殊性都无法否认，东西史前文化的交汇、游牧与农业人群的交融，都在此体现得淋漓尽致。从这一角度来看，将天山北路墓地称为新疆东部史前文化的“聚宝盆”可谓名副其实。

第三，如何认识甘青和新疆两地之间的史前文化交流。

不论是发掘者还是发掘报告，都指出天山北路墓地材料反映出新疆哈密地区与甘青地区多支考古学文化有明确的交流与互动，且认为在墓地偏早阶段，属于西域驿文化与四坝文化

竟反映的是跨区域的文化交流，还是不同区域能够独立孕育出相同或相似的文化特征。如果是前者，说明这可能是一种新的文化交流模式，当然也不排除两地文化传播的中间环节尚未发现的可能。如果是后者，则必须要思考，在自然地理条件完全不同的两个区域，因何能有相似或相同的文化表现，对于这种文化现象应如何理解。从目前已有的各类线索来看，前者的可能性要更大一些，因为距今4000-3300年的西域驿文化和四坝文化，分布区域已经遍及新疆哈密、河西走廊和甘青东部，这一区域早已连成一个文化整体。所以，至卡约文化和寺洼文化阶段，两地存在文化交流也就不足为奇。此外，在较天山北路墓地更西的洋海墓地，曾经发现过一件典型的卡约文化马鞍口陶器，研究者对此有过专门论述(李水城，2009)。同样，在以洋海墓地为代表的苏贝希文化，盛行一种典型的彩陶纹样——旋涡纹，而这种彩陶纹样也是甘青地区“唐汪类型”的指征性陶器，虽然关于二者孰早孰晚学界尚有争议(韩建业，2007；邵会秋，2012；任瑞波，2018)，但两地陶器面貌的共性有目共睹。种种迹象表明，至迟在距今4000年左右，史前“丝绸之路”雏形已初步形成，哈密地区至整个河西走廊乃至青海东部都可纳入其中，远距离的人群流动和跨区域的文化交流早已有迹可循。

上述三个问题，涉及墓地分期、文化性质判定和文化交流融合，虽说都属于天山北路墓地考古学基础研究的范畴，但它们直接关系着学界能否准确并深入认识距今4000～3000年哈密及周邻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分布格局、演进态势以及史前丝绸之路的发展演变。

总之，《新疆哈密天山北路墓地》的出版在解决了一系列困扰学术界已久问题的同时，也促使读者产生一些新思考，而这些思考有助于推动学界更加清晰地认识欧亚草原文明、绿洲文明和黄土高原农业文明的接触互动与深度交融。作为距今4000～3000年前中国西北地区大范围文化交汇与碰撞的典范，天山北路墓地无疑是研究中国史前丝绸之路的重要文化切片，而新疆哈密也是堪称“西域敦煌”的历史富矿。

【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重大项目“边疆考古与中华早期文明研究”(项目编号2022JZDZ024)和“全国考古人才培养计划”(项目编号2024-26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考古学院】

《新疆哈密天山北路墓地》
编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哈密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哈密市博物馆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出版社：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10月



而史前考古对农史研究，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山东临淄赵家徐姚遗址、福建平潭壳丘头遗址群、湖北荆门屈家岭遗址等地，均出土火窑遗迹、贝壳堆、炭化植物种子等与农业有关的遗存，在陶器上也发现淀粉粒等。从更宏观的角度而言，这些发现也展现了不同区域文明起源和形成阶段的农业发展状况。湖北荆门屈家岭遗址、浙江余杭良渚遗址发现的水利工程遗迹，更向我们证明了先民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不同地区关于史前农业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汇聚起来，证明多样的气候环境条件与物产，加之大型的水利系统，为农业持续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进而为中华文明的连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此外，遗存无声地诉说着史前时期人类衣食住行和日常生活生活的点点滴滴，不禁让人产生与先民心灵相通的感觉。考古研究拉近了我们与历史的距离，让我们体会到，即使是石器时代，也并不遥远，万年之前的许多生活细节，至今仍留存在我们身边。

正如《新时代》前言中所说，考古发现“不但建立起历史的时空框架，更丰富了历史的脉络与枝叶，进一步勾勒出中华文明起源和多元一体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内涵丰富，远非《新时代》中的120项新发现所能概括。书中体现的考古理念、技术进步与发掘研究成果，也只是十多年来中国考古发展的一个缩影。考古工作任重道远，期待未来的中国考古，能够通过先进、科学的手段与方法，进行细致严谨的发掘与研究，努力拓宽研究边界，更生动具体、有温度地阐释古人生活、古代社会的变迁，展现中华文明的面貌，让更多人了解，我们脚下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过怎样的故事。

(作者单位：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新时代百项考古新发现》
编者：中国文物报社 中国考古学会
主编：陈星灿 柳士发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12月

2025年3月，著名考古学家伊恩·霍德(Ian Hodder)的新著《纠缠：人与物之间关系的考古学》(第二版)(以下简称《纠缠》)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该书在第一版的基础上，吸收人文社会科学中的新物质主义与本体论转向的思潮，从理论内涵、方法与案例实践的层面系统论述了人与物之间关系的纠缠理论(entanglement theory)，反映了当代考古学理论的发展趋势。

何为纠缠理论 在《纠缠》一书的第一章，霍德对纠缠理论的三种含义变化进行论述。在2012年的第一版《纠缠》中，霍德将纠缠定义为人对物的依赖、物与物间的相互依赖、物对人的依赖，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的总和。在之后的研究中，霍德发现，很少有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不涉及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涉及物的情况。因此，霍德在2016年出版的著作中将纠缠重新定义为，由积极的依赖关系与消极的依附关系组成的辩证与双重约束关系，即人依赖的物反过来也依赖于人束缚人的自由活动。如人与驯化的动植物相互依赖，但人对驯化动植物的照管将人束缚在土地上。霍德在2018年出版的著作中，详细论述了该定义中的双重约束性，并用纠缠理论解释宏观的社会演化，揭示了人类社会演化的一般方向性，即人在利用物解决各种事情时产生的纠缠让人不断陷入自身活动的意外后果，同物的纠缠关系不断加深，而这种一般方向性在不同的社会中有具体的物质表现。

在《纠缠》一书的第二至第七章，霍德以上述定义为基础，在对以往有关人与物之间关系的理论进行评述的基础上，论述了人与物的四类依赖关系。这些理论包括现象学、物质性、认知考古与物质参与理论、操作链、行为链、物质文化生命史、行为考古以及人类行为生态学等。同时，该书增加了新章节，从不平等、权力和情感纽带三个方面论述了人与人之间的纠缠关系，并同本书第七章一起，构成了人与物之间的抽象纠缠。霍德指出，由于被统治阶层受到人与物之间的纠缠及统治阶层的双重约束，手里的资源配置不足以让其摆脱不平等和贫困。此外，人与人之间还会在生与死、爱与恨、对祖先的崇拜以及在不同感官、不同领域营造相同意义与情感层面产生联系。霍德在《纠缠》一书中第七章中论述了土耳其恰塔霍裕克(Çatalhöyük)遗址割人头与兽头的现象所反映出的物的功能性、不同领域的抽象观念，以及具身实践三者具有的观念一致性：在恰塔霍裕克，将祖先的头骨留给后人保存具有构建历史记忆、维护社会延续性的作用；在近东，割头的现象历史悠久，并可能同某种神话相联系；割头作为一种观念，广泛存在于室内装饰、壁画、雕塑、陶器等不同时空背景下的多个领域；割人头和兽头，以及在给头骨、房屋墙壁与地面抹泥的这几个场景具有身体感知上的一致性，使人们在经历一个场景时会想起其他场景，让头骨和抹泥这两件事物在社会中能够传递神圣性。霍德虽然承认了既往的理论思想的重要贡献，但也指出其所研究的人与物的关系是不全面的。对此霍德在《纠缠》一书的第六章中，从物的物理过程与时间性

角度对纠缠关系进行论述，认为纠缠在日常时间中将物质、观念和社会联系在一起，并借用了经济学中的路径依赖理论指出了人与物之间的相互羁绊与束缚是纠缠理论同其他理论相比的重要区别，认为这种羁绊关系对事情的走向起到决定性作用。

在霍德看来，以上有关纠缠的两种定义将人与物看作是有形的、稳定的不同实体，但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们很难界定人与物的边界，人和物都包含了各种物质、能量与信息流，而且人的身体、心智、人格等也延伸到了物质世界。对此，霍德受到过程哲学与各种新物质主义思想的影响，在对行聚合网络理论(Actor Network Theory)、集合体理论(Assemblage Theory)、本体论转向以及能动实在论(Agential Realism)等理论进行评述的基础上，在《纠缠》一书的各种章节详述了纠缠的第三种定义，将其看作是各种物质、能量、信息、欲望等事物过去流向未来的、具有矛盾性质与混杂状态的流动与生成过程，而事物正是在这种流动的混杂状态下生成的。该定义让纠缠理论实现了“由物到流”的转变，从本体论角度指出构成世间存有的是物质、能量、信息、欲望的流动、过程和力场，而过去、现在、未来，以及时间与空间都处在不断变化、运动和生成的过程之中。霍德将纠缠理论的关注点转移到事物的流动与生成过程的做法，表明霍德试图将纠缠理论纳入当下流行的以过程哲学为基础的进程考古之中。对此，第二版《纠缠》一书的英文名增加了A New Archaeology字样。但这并不是说纠缠理论退回了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新考古学(即过程考古学)，而是在说明纠缠理论同当下世界考古学发展的新趋势一致。

除了关注动态的纠缠关系外，《纠缠》一书同十年前的第一版相比，在方法与实践方面增加了很多新内容。在第八章与第九章中，霍德论述了考古学家如何应用动植物考古、功能分析、科技分析、行为考古与行为链、网络分析、物质文化生命史研究、高精度测年法、路径分析、多元回归分析与数学建模等方法，对遗址

内部的纠缠关系进行深描，重建人与物在时间与空间上的纠缠关系、研究中国与近东地区农业与定居的发生、阐述陶器出现的动因、对不同遗址的人与物关系进行比较研究，并去解释社会文化变化。由于霍德主张的是类似“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的动态时间观，因此霍德并没有像以往考古学界去追溯“起源”问题，而是主张并不存在“起源”的时刻，存在的只是事物持续发生的过程。霍德进而指出，变化与新事物的涌现是在人们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发生，是纠缠的复杂性、异质性与矛盾性所引发的后果的这一普遍性过程。

纠缠理论与当代考古学理论的发展 若将《纠缠》同霍德另一本重要著作《阅读过去》进行比较，可以看出《纠缠》一书反映了当下世界考古学理论发展的趋势。在《阅读过去》一书中，霍德系统论述了后过程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提出情境考古学与阐释考古学的理念，主张应用结构主义与社会实践理论，并吸收心态史、新文化史及观念主义、历史哲学等思想，将物质文化看作可以“阅读”的“文本”，对物质文化在古代社会历史背景及当代社会背景中的社会与结构意义进行多元阐释。其中，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惯习(habitus)(或习性)理论是后过程考古学中最重要理论之一，考古学家应用该理论研究社会凝聚力的构建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反身研究法，将理论、方法与材料整合在一起进行多元阐释与多重叙事，将考古实践同当代社会问题与知识生产相结合。

从中间可以看出，后过程考古学是从主体间性与阐释学的角度，并结合某些普遍的人性观以及物质文化的普遍社会功能等视角，对物质文化的结构与社会意义进行情境化“阅读”。虽然后过程考古学对能动性、社会性、情境性与历史性的强调是对过程考古学的发展，但其本质上将物质材料看作象征符号并过于关注其抽象含义的做法也饱受诟病。学者指出，后过程考古学将现代主义强调人的理性、特殊性与能动性的做法发挥到了极致，而物则一直处在静默的失语状态，是人的意志与话语的产物。当代社会中出现各种复杂的环境与社会问题，让人们意识到在这些问题上，人的能动性是有意义的，起作用往往是以往被人们赋予各种含义的物。这使得学界开始对物去概念化、去语义化，去恢复物的本来面目并关注不同物间的复杂联系对物质文化的作用。当代考古学理论从关注符号与意义，转变为关注事物间的动态联系。在《纠缠》一书中，有多处涉及了这两种理论取向的差异。霍德在论述抽象的纠缠关系中，明确反对对各种风格实践(如新的音乐形式)与行动方式看作是文化整体或惯习的一部分，而是将其放在复杂且广阔的物质—技术—社会—思想—身体—情感的纠缠关系中进行考量，认为所谓“文化”“风格”“惯习”等抽象事物都是在动态关系中产生的，是身体、情感、感官、话语、物质之间实现和谐与共鸣的产物。霍德不仅强调这些抽象事物所具有的物质基础，而且更多是从之前对物质文化的静态情境构建转向人与物之间的动态物

质过程，认为抽象的文化现象与社会变化机制是在具象的物质纠缠中产生的，从而让后过程考古学关注的静态理念之物回归到动态具象之物。

这并不是说当下受新物质主义影响的考古学同后过程考古学完全决裂。正如布鲁斯·特里格(Bruce Trigger)所说，考古学的发展并不存在严格的范式转换，新出现的理论是建立在以往理论的基础上，是对以往理论的扩展。纠缠理论中不乏后过程考古学的元素，如对纠缠关系的构建是建立在行为考古、多学科研究、高精度发掘与反身的方法基础上，而前者更是过程考古学的遗产。与此同时，纠缠理论所揭示出的当代社会中存在的贫富差距、阶级固化与不平等现象，则继承了后过程考古学对当代社会的现实关怀以及从当下关注的社会问题出发的做法。更重要的是，霍德明确指出了包括纠缠在内的考古学研究所具有的阐释特征，认为考古学家在应用考古证据构建纠缠关系、再现古代社会的世界观时，是建立在对考古证据的功能与作用进行情境化阐释的基础上，如恰塔霍裕克遗址野牛头具有的特殊生命力是考古学家在其出土背景与共存关系的基础上进行阐释的结果。

《纠缠》一书既是霍德本人考古学思想转变的集中体现，也反映了近二十年来当代考古学理论的发展。相信书中所述的纠缠理论因其将普遍性与特殊性、科学与人文、人与物、物质与观念、情境与过程相结合，以及强调自下而上分析考古材料的旧大陆学术传统，会为当下中国考古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和中国文明起源的过程与机制研究带来新视角、新方法。

(本文系译者对《纠缠：人与物之间关系的考古学》所作译后记，刊发时有删改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纠缠：人与物之间关系的考古学》
作者：[英]伊恩·霍德 译者：刘岩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5年3月

新时代考古，诠释中华文明的生动画卷

胡雪琪

历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以下简称“十大”)推介活动，对于考古文博从业人员、爱好者、专业师生乃至更广泛的社会大众来说，都不陌生。推介活动既坚持学术标准和考古发掘的科学性、真实性、严肃性，又关注考古文物知识的普及、传播与推广。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陕西神木石峁遗址、浙江余杭良渚遗址等一系列学术意义重大、备受公众关注的遗址，最初都是通过“十大”推介活动进入大众视野。

由中国文物报社、中国考古学会联袂编写，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新时代百项考古新发现》(简称《新时代》)一书，以2022年举办的“新时代百项考古新发现”推介活动为基础，将2012～2023年的“十大”推介项目汇于一书，集中体现了新时代以来中国考古取得的丰硕成果。本书入选2024年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2024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并获“2024年度全国文化遗产十佳图书”。12年，120个考古项目，见证了考古人上下求索的历程，也见证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与繁荣。

不同于普通的历年“十大”资料汇编，书中收录的考古项目，并非按推介年份罗列，而是按遗址本身的年代顺序编排，分为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夏商周、秦汉、三国至隋唐、宋元明清六个部分。每个部分约请相关方向的著名考古专家撰写导读，让读者对这一阶段的考古发现及研究有提纲挈领式了解。各个考古项目，除了文字叙述，还有丰富的配图，全面展示遗址概况、遗迹现象、出土精美文物，以及发掘工作场景。全书仿佛一幅生动的画卷，展现着新时代以来中国考古学这棵枝繁叶茂的大树上结出的累累硕果。十多年来中国考古学的进步，也通过一个个具体的项目，变得切实可感。

的确，新时代以来中国考古取得的丰硕成果，很大一部分归功于考古学学科本身的进步。十多年来，无论是学科发展的理念，还是具体的田野发掘技术与研究方法，都在进步。在学科理念

上，考古学这一传统意义上的“冷门”学科，正在逐渐走向社会，适应当代社会发展的需求。考古人正在积极尝试“走出象牙塔”，充分利用出版物、自媒体、考古文博类的线上线下活动、纪录片乃至综艺节目等，普及考古知识，增进公众对考古的了解，让更多人感受到文化遗产之魅力。四川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在考古发掘的同时开展公众考古活动，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志愿者，并且发掘全程都有志愿者参与，在全国尚属首次。志愿活动为公众了解考古、参与考古提供了平台，也扩大了考古对公众的影响力。

具体的发掘研究技术与方法进步，则更为直观。目前，遥感、无人机航拍、考古数字化记录系统等设备、手段，已经在考古发掘过程中得到广泛应用；洞穴、水下等非常规环境中的考古工作，更有赖于新技术的使用。例如贵州招果洞遗址，发掘人员使用集成有newplot函数功能的手簿和全站仪联机作业，大大提升了发掘工作效率和记录精度，为后期的遗址分期、空间分区和人类行为阐释工作奠定了基础。在南海沉船考古中，使用科考船及载人潜水器，对位于水下千米级深度的古代沉船遗址开展系统科学的考古调查、记录，为相关研究提供了细致而全面的资料。

新技术、新方法的使用，与考古工作在历史研究、文明探源等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是相辅相成的。关于周代的曾国，文献记载语焉不详，但湖北随州的枣树林墓地、文峰塔墓地，枣阳郭家庙墓地，皆是以东周曾国国君墓为中心的墓地，曾侯乙墓更是举世闻名。墓地的分布、墓葬的形制结构和出土的大量随葬品，以另一种形式书写了完整的曾国史。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四部织机模型，是迄今国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多综多蹑织机，与织机伴出十多样彩绘木俑，推测是汉代蜀锦纺织工场实景的模拟再现。如果没有细致的发掘工作作为根基，考古学填补历史空白的作用就无从谈起。

在文明探源方面，农业和文明起源密切相关，